

合作化小说女性形塑中的性别政治

○ 耿庆伟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在“合作化”小说宏大叙事中,女性虽然参加了社会的历史进程并被编织在意识形态话语中,但当国家、民族等概念占据叙事中心的时候,作家的女性书写因无法用心灵去感受女性的真实存在导致女性“他化”:性别雄化下性别主体的悬置;形象丑化下的性别角色的遮蔽;情爱叙事中的性别失衡。小说叙事中的政治修辞一方面让这些女性形象获得了被主流话语所认同的新社会新女性的合法身份,另一方面又遭遇了主流政治话语任意编码和随意填充,这些女性因自身主体性的缺乏陷入了被意识形态话语建构起来的虚幻镜像。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主体悬置;性别遮蔽;宏大叙事;性别政治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展开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现代化民族国家工程建构的重要步骤,在这场牵涉中国前途和命运的社会结构转型中,农业合作化小说理所当然地承担着国族动员和前景展望的政治使命。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坚定捍卫者和合作化路线的热情鼓吹者,作家身体力行地用作品努力配合着中央精神对合作化运动进行着一系列的建构和形象化设计,充分发挥着文学的意识形态整合功能,对政策的诠释和路线的推演形成了合作化小说的宏大叙事特征。这场运动同时也与女性的命运休戚相关,从国家层面来看,动员尽可能多的力量投入到运动中是当务之急,而女性正是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重要资源和战略后备军。“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和政治的庄严允诺为女性提供了与男性同场竞技的社会舞台,也为女性的社会解放提供了重要的平台。那么女性的解放是否可以在合作化运动中得到实现,她们在逃离剥夺女性权利的“私人”之家奔赴广阔的社

会大舞台的进程中又将面临怎样的性别尴尬呢？借助合作化小说的解读，可以透视女性的真实社会处境和思想境界，检讨当时女性解放的真实程度和具体水平；利用小说文本的缝隙更可看清女性“他者化”的历史事实及宏大叙事背景下潜藏的性别政治。按凯特·米利特的说法，男性控制与支配女性的制度无论表面上多么沉寂，但实际上仍是“我们文化中最普遍的思想意识、最根本的权力概念。”^[1]如果说，种族关系、阶级关系是一种政治关系，那么性别关系同样也是一种政治关系，这也是《性政治》中的一个核心观点。

一、性别雄化下的性别主体悬置

英雄一词在很长时间内是男性专用的。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意识形态话语的护佑，50年代的女性越来越倾向于离开家庭融入社会，她们在男人为中心展开的生产建设中模仿男性，认同男性社会的价值观念，积极献身于社会主义的远大目标，渐次具备了英雄的品格和信仰。合作化小说倡导女性像男人一样参与国家建设，涌现了众多生产战线上的女英雄形象，如孟祥英、肖淑英、李双双、张腊月等。李准的小说《李双双小传》中的李双双就是一位大胆泼辣，敢想敢干，公而忘私的时代新女性，她在生产劳动中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样的叙事安排契合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女性的审美期待和社会角色认定，是权力叙事和女性叙事的一次“合谋”。走出家庭的李双双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组织的肯定，当上了食堂管理员，入了党，成了先进；由受压抑的对象成为丈夫喜旺学习的目标，夫妻关系改善，互敬互谅；为自己正了名，为女性树立了榜样，努力实现着女性孜孜追求的两性关系和谐和社会平等。我们并不怀疑作者讲述故事的政治忠心和情感真实，也不否认这样的故事在历史的某个节点确实出现并存在过，那么李双双究竟争取的是何等层次的解放呢？

合作化运动客观上为妇女走出家庭，实现权利提供了广阔的公共空间。据相关统计，妇女参加劳动的比例随着新中国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的开展而呈上升趋势。1950年，农村妇女参加劳动的只占妇女劳动力的20%—40%，到1957年，农村适龄妇女中有70%参加了劳动，到1958—1959年，有90%的妇女参加了劳动。^[2]但纵观几十年妇女解放的历程，李双双式的女性解放设计不过是李准一厢情愿的情感投入，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期待和妇女个人诉求契合的互惠行为。妇女只是被主流话语用来开展合作化运动的一种巨大人力资源，并不是一个享有与男性同权的独立性别群体，动员女性参与社会劳动是意识形态对女性的一次身体“征用”。因为特定的政治权力“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印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种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3]合作化小说中的女性形塑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女性身体的训诫，无论作者怎样潜心试图拔高李双双的精神境界，文本的裂隙还是不断刺破解放的幻象：公共食堂虽办起来了，但浪费现象普遍存在，公器私用更是防不胜防，食堂人员也不得不知难而退。尽管李双双依靠自己的坚持，通过不断改良烹饪技术赢

得了群众的肯定和上级的褒奖,但仍面临诸多实际的困难,李双双的公共食堂之路注定是一次失败的历险。作品发表一年后就在现实社会中出现了恶果:由于全国性的大饥荒,公共食堂被迫解散,历史的真实与文本的真实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因此:“公共食堂既非由妇女解放提出,也非以妇女解放为圭臬,不过是妇女解放话题与宏大叙事一段恰巧相遇的短暂因缘。它也许提供了女性参与集体劳动狂欢的表象,但绝不代表女性由此而得到相应的权利。”^[4]

普遍认为女性参加公共实践的集体劳动是农村妇女获得自主自立的重要方式,也是女性分享民族国家主体身份的重要途径。李双双确实通过生产劳动完成了对妇女传统角色的转变:无名状态的“喜旺家”、“喜旺媳妇”、“俺小菊他妈”成为人所共知的李双双,当了干部,人聪明了,模样漂亮了,权利也提高了。李双双身上焕发出新的品质:坚持原则,乐于奉献,敢于突破自己。在这篇被评论家视为“女性的欢歌”^[5]的作品中李双双真的一路欢歌吗?其实她的许多困境皆因叙述的需要而被作者故意遮蔽了:孩子谁来照顾?喜旺真的能彻底改变大男子主义?一家人的吃饭穿衣又该如何解决?小说看似轻巧地化解了李双双的现实困境,但终究难掩其身心的疲惫,她不仅仅要承担传统的家庭事务,又背上了沉重的社会责任。文本中作者只强调妇女参加生产及在经济上的贡献,却对妇女如何从传统男尊女卑的家庭伦理规范中解放出来保持了缄默。她不是更轻松而是“妇女解放,扁担上身”了,成了一个祛除“女性”性和多样性的雄性化女性。以“男女都一样”的无性别差异为标榜,将女性塞进意识形态的指令是国家对新“妇女”形象一次编码归置和内涵建构,即通过对女性社会性别的再造,将其纳入国家生产建设的队伍中来。“妇女只有依从男性意识形态的严厉规则,才可表现为支持者或社会变革中的参与者。”^[6]对女性身份和主体意识进行“男性化”赋予和政治化“拔高”并非为了建构女性的性别意识,女性为了获得和男性一样的国族主体性,就必须以契合“工农兵”要求的形象出现:“将工农兵‘妇女’当作‘党’之名和集体主义的载体,使之构成一个彼此指涉、相互证明的社会主义‘崇高形象’的链条。”^[7]以男性作为衡量女性的能力标准却忘却了性别,雄化修辞突出“非女性”特质却褫夺了女性展示自身性别魅力的机遇,在虚幻的解放图景中遗失的恰是女性真正的主体身份,这也是意识形态对女性性别索取的历史代价。被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成功收编的具有雄性美的女性,既解决了因劳动力短缺造成的现实问题,又被虚设了“男女都一样”的社会身份认同,其真正实质却是特定历史时期中民族国家共同体想象对女性话语的挪用和置换。

二、形象丑化下的性别意识遮蔽

官方话语倡导的大而化之的“男女平等”根本无法唤醒女性自觉的性别意识,经历了女性雄性化尴尬的女性仍无法摆脱集体无意识深处的性别观念。在社会主义美学规范下,作家一方面塑造“高大无私”、“品德高尚”而且具有“鲜明党性”的工农兵劳动妇女,另一方面指斥生产劳动中体现出来的危及合作化运

动的危险因素。宏大叙事断裂处流露的关于女性的美丽、脆弱、“自私”、“落后”等品质皆因有可能侵蚀民族国家建构而被划归为损害社会主义建设的“异质”力量。“国家是使所有臣民隶属于它的主体，而异质成分则被剥夺其主体性而不隶属于国家主体。”^[8]在合作化小说的写作中，作家往往启用国族话语改装女性的“性别”属性，通过叙事干预置换非正面形象，挤压溢出社会行为规范之外的“落后”女性生存空间，使之归依男性文化秩序，从而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建构提供重要支撑。

农业合作化小说中“落后妇女”形象主要有：“常有理”、“能不够”（《三里湾》）、“小腿疼”、“吃不饱”（《锻锻炼炼》）、赵素芳（《创业史》）、孙桂英（《艳阳天》）、钱彩凤（《金光大道》）、羊秀英（《风雷》）等。根据这些落后妇女共同表征可以将之概括为两类形象：一类是身份模糊，行为不洁，都是富农、富裕中农、中农的妻子。她们都有婚外性经历，这一道德劣势成了她们性堕落的前提。素芳在婚前被人诱奸，带着身孕嫁给傻头傻脑的栓娃；孙桂英少女时代就相继被继父和继父的儿子奸污；羊秀英在婚后被反动富农黄龙飞强行霸占后成为一个性生活糜烂的女人。第二类就是不爱劳动，不关心政治。《三里湾》中玉生的前妻小俊不仅不喜欢劳动，还阻碍丈夫为公家工作；《山乡巨变》中社长刘雨生的妻子张桂贞贪恋温情，好吃懒惰，搞得家里米缸、水缸常常是空的；《锻锻炼炼》中的“小腿疼”、“吃不饱”则是不参加集体劳动的坏典型。这些妇女的“病症”潜藏着对落后女性形塑的话语逻辑和文化观念就是：不关心集体和周围的政治运动的人行为上是丑陋的，道德上是堕落的，必然在政治上也是反动的，这些“沉醉”于个人生活和私人感情的女性形象只能接受文学叙事的丑化命名。

在中国道德标准评判下，正面女性应该贤良淑德、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如果稍有姿色、出身不纯、与异性交往随便那就简直是道德败坏，如果她们的美貌会将男性置于危险的境地就更为时代所拒斥。“十七年”是神性高涨的时代，要求正面英雄人物像神一样行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上，时代精神话语规约掩盖了个人行为的世俗性，而在“落后妇女”身上正隐藏着革命现代性所无法容忍的世俗情欲，只能成为被改造和规训的对象。作者通过设计女性的生活结局，对落后妇女的婚姻进行降级处理：素芳在生宝的教育下只能安分守己地和榆木疙瘩栓栓过日子；漂亮的张桂贞最后委屈地嫁给了长相、能力一般的光棍“符癞子”；羊秀英则成了男人“要玩便玩，要耍便要，要甩便甩，要扔便扔”的玩物。将女性的政治落后溯源至道德陷落，在高亢的时代话语下依然操持着传统的道德观念和性观念，而且常常据此标准去衡量判断人物的道德品行。“性与政治”之间逻辑批判关系即是通过身体评判和道德指认对游离于“集体”生活之外的个体进行政治批判，一个女人可以不理睬政治落后和思想消极的指责，但绝对无法容忍性堕落和道德败坏的侮辱。

在小说《锻炼锻炼》中，大部分农村妇女都以各种理由逃脱集体劳动，“吃不饱”和“小腿疼”因不劳动成为众矢之的，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其实所谓好吃懒

惰的女性大多为 30 岁左右,已结婚生子,生活负担重,家庭压力大。她们呆在家里也并不清闲,常要带孩子、洗衣做饭、喂鸡喂猪等。走出家庭参加生产劳动对于无家庭拖累的未婚女性问题不大,对于已婚女子来说却是相当困难的。承担了家务劳动却被贴上落后的标签,只能通过装病等方式发出自己无声的抗议:“身体是一个整体社会的隐喻,因此,身体中的疾病也仅仅是社会失范的一个象征反应”。^[9]“妇女能顶半边天”口号式的社会动员本身就是以男性标准规约女性行为,表层观念上男女平等根本无法消解深层次上传统的性别秩序。“性别平等”作为一种政治观念提出后,大量的女性虽然参与了生产劳动,但传统观念依然将家务的打理与女性的责任联系起来,尽力投入工作而没有打理好家庭的女性仍是失职的母亲或不合格的妻子。可见女性落后的原因并不在于“个人的品质”落后,而是女性的不参加生产劳动威胁到合作化这一大命题的合法性。动员妇女参加社会劳动并非是以妇女解放为出发点和归宿,而是有着弥补劳力短缺的功利性需要,另外也缺乏对妇女走出家庭的制度性设计。妇女走出家庭必然打破原有的家庭—社会结构,是一个依赖于系列替代和转换的系统工程,在农业合作化的强大语境中现实政治诉求覆盖了女性的性别伸张,在压抑女性的传统家庭结构没被撼动的情况下,女性的身体必然对这种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做出强烈的生理反应,在合作化小说的文本角落里处处留下女性普遍腿痛、饥饿、生病等“病态征象”。

三、情爱叙事中的性别失衡

如何在“一体化”时代语境下规范并讲述情爱一直是一个极为敏感但又割舍不掉的问题。在合作化小说的文学生产中,被政治理性整编后的爱情逐渐摒弃初级的男女之情,并强行将爱情与“阶级”等民族国家指涉的“高级情感”紧密关联,以爱情如何服从生产的需要来讲述建基于阶级情感和共同理想之上的“伟大”爱情。“只有牺牲身体此在的优先权,律令才会获得生存领域的特权和神圣性。”^[10]通过对划定爱情边界或将其嵌入宏大叙事的链条之中,国族话语“收编”和“整改”了一己私事,在情感与政治的转换书写中,国族话语成为行为主体选择和取舍爱情婚姻的理由,有效地监督情爱的发展,推崇政治理性成为合作化小说情爱叙事中普遍存在的特质,“劳动+爱情”成为理想的爱情模式。在这种叙事逻辑下,那些泯灭个人情欲、甘心走合作化道路,和男主人公一起同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爱情”受到了褒扬,最终皆是政治话语全面主导爱情话语并升华爱欲。

合作化小说中存在大量奇特的爱情叙事:焦淑红放弃马立本选择“死了媳妇三年不续弦”的萧长春,就是因为萧长春的事业心和坚定信仰赢得姑娘的芳心(《艳阳天》);范灵芝亲近王玉生,主要原因在于王玉生心灵手巧,是技术专家,而且热心集体,而马有翼对集体事业态度模糊(《三里湾》);刘雨生和一个不关心集体的女人(张桂贞)离婚,而与一个合作化运动的拥护者(盛佳秀)结合

(《山乡巨变》)。

最典型的是小说《创业史》，聪明美丽、追求思想进步的改霞抵御了物质财富的诱惑，拒绝了有文化的富裕中农郭世富之子郭永茂的求爱，爱上了善良朴实、正直肯干的梁生宝，两人郎才女貌，彼此属意，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改霞却并没有得到幸福的爱情。为什么有情人难成眷属呢？书中交代是改霞在村主任郭振山的鼓动下产生了考工厂的想法之后引发了梁生宝的误解。其实这只是表面原因，事件的主动权依然完全掌握在生宝的手中，只要史诗主人公梁生宝在“结婚和留下”问题上给予改霞一个明确的答复，局面完全可以改观，而此时的生宝一直对改霞语焉不详、躲躲闪闪。可见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柳青的创作立场以及《创业史》中的情爱叙事模式构成了强力规约。尽管小说中对这一叙事话语隐藏得很深，但却始终对作者和主人公施加影响，只要经过仔细的文本分析就可以窥见潜藏其中的性别政治及其真正的问题所在。

在农业合作化小说中，合作化运动是凌驾一切之上的政治叙事主题，个人的行为选择（包括爱情选择）必须紧密配合并服务于这一政治目标，造成合作化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政治爱情婚姻模式及相应的爱情选择标准。作为民族国家主体的男性理所当然地是合作化运动的主体，男性首要任务就是领导和从事合作化事业。女性不仅需要在政治上和男性保持高度一致，走出家庭，成为男性合作化事业的参与者，而且还必须在精神上支持男性，在生活上照顾男性。改霞与生宝爱情的搁浅就是因为思想观念上的分歧而失去了共同理想的支撑，改霞“奔城里的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实质上等于放弃了与梁生宝共同搞互助合作的最初理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改霞的理想迷失也就失去了爱情进一步发展的合法性基础，合作化时期两条路线分歧与斗争直接导致了改霞与生宝的分道扬镳。

西蒙·波伏娃认为：女人不是天生，而是后天形成的。女性之所以成为女性，并非个人的主观诉求和“个人的品质”先定，更是一套社会化制度的安排，女性对主流话语规范的挑衅和男权文化的霸权突围必将招致堵截和规训。文化程度较高的改霞身上体现的新品质、新气质也让生宝感到无形的心理威压并引发深刻的内心思想斗争，有时候想“改霞人样俊，心性也好，他要争取和她成亲”。有时候又想：“算了吧！人家上了三年级啦，恐怕这阵心大了，眼高了。咱庄稼人，本本分分，托人在什么村里瞅个对象，简简单单结个亲算了”。看来当女性对解放的期待和对婚姻的期许远超男性的心理预期时，就已经越过了男权话语允许的心里围墙，对现代性行为主体梁生宝们的心理冲击是致命的，也是无法得到乡村男性认可的。“提高妇女在经济、生产上的作用，是能取得男子同情的，这是与男子利益不冲突的，从这里出发，引导到政治上、文化上的活动，男子们也就可以逐渐同意了。”^[11]此论一针见血地点破问题的真相，新秩序要照顾到民众与旧的伦理文化难以割舍的联系，年轻女性的独立自强与根深蒂固的乡村男权观念的对立冲突却构成了对乡村男性的威胁。解决的办法只能通过妇女权益的让渡达到对男性权益的维护，以便让读者感到传统伦理美德并未在女性身上消

失。相较而言,生宝的媳妇刘淑良则迎合了深植于男权文化中的道德伦理对女性的形象期待和行为要求,她体格健壮,不仅承担了传统家庭妇女应承担的活动,还参加了社会生产,更重要的是她对传统妇德和男性的顺从。说白了小说设置刘淑良这一女性形象就是要告诉读者:只有热爱劳动、甘心扎根农村,能为合作化事业奋斗一生的女性才是梁生宝们志同道合的妻子。作者往往根据不同的政治需要让女性性别群体穿梭在“家庭”和“社会”之间,但关于她们的价值标准设定是相当混乱,以“妇女解放”的名义对女性进行社会性别重塑并未意味着对女性传统美德的否定,而在某些时候这些美德是被刻意强调的。

“性政治”是男女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是男性维护父权制、支配女性的策略。在合作化小说的叙事中处处可见作为男权话语“替身”的道德话语、制度话语、政治话语对女性话语的挤占,在男性作家的作品中一再敞露出现实社会中的性别政治。女性虽然参加了社会的历史进程并被编织在意识形态的话语洪流中,但却成为一群没有主观吁求,缺乏主体心理体验的“他者”。当国家、民族等概念占据叙事中心的时候,作家在堂皇叙事的框架中进行女性书写自然无法用心灵去感受女性的存在。女性思想的先进和落后,家庭与社会间的徘徊与纠葛,情爱选择上的理性还是冲动都受到阶级身份与现实政治的规训,其自身主体性皆因合作化叙事的遮蔽而隐失,小说叙事中的政治修辞一方面让女性获得了被主流话语所认同的新社会新女性的合法身份,社会视域下的女性是和男性一样的“准男人”形象,另一方面却又需要接受男性视域的性别投射而成为一个欲望化的对象,在意识形态话语钳制十分强大而男性规范统摄整个社会运行机制的语境下,女性在合作化小说叙事中成了被主流政治话语任意编码的符号。

注释:

- [1] 凯特·米利特:《性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3页。
- [2] 董丽敏:《性别、语境与书写的政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4页。
- [3] 福柯:《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1999年,第27页。
- [4] 王琳:《真理缝隙中的生存:当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44页。
- [5] 蓝爱国:《解构十七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3页。
- [6] [克罗地亚]克内则威克:《情感的民族主义》,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49页。
- [7] 曹霞:《“妇女”想象与社会主义美学的规约——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性别视角及其功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 [8] [美]酒井直树:《现代性与其批判: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问题》,张京媛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09页。
- [9] [美]布莱恩·特纳:《身体问题:社会理论的新近发展》,汪民安译,汪民安、陈永国编:《后身体:文化、权力与生命政治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页。
- [10]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49页。
- [11] 毛泽东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妇女解放》,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6页。

[责任编辑:黎虹]